

汉语中与战争有关的字词多含“戈”，字有战、伐、戍等；词有枕戈待旦、止兵息戈、大动干戈、化干戈为玉帛、反戈一击等。由此可看到戈在古代兵器中老大的地位，这一地位一直从远古保持到秦汉。

“戈”为何能成为古代第一兵器？



从作战的角度来看，戈与刀剑斧矛等相比，战斗力明显逊色。戈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有带柄兵器，可用于勾、啄、割等。它有横刃前锋，垂直装柄，其内刃用于勾割，外刃可以推杵，而前锋用来啄击对方。当用戈钩住敌人回拉时，自然同时也将自身的要害暴露给对方了。将敌人拉向自己的风险很大，一旦不能重创敌人，很容易反遭其害。如果采取啄击的方式，戈的战场杀伤力又明显不如刀与斧等。

那么，战斗力具有很大局限性的戈为何能成为古代第一兵器？原来，“戈”成为古代第一兵器的主要原因与当时盛行的作战方式有关。

先秦时期，作战方式以马拉木质战车的交战为主。据有关资料推断，

夏代已开始使用战车进行小规模车战，经商代、西周以迄春秋，战车一直是这一时期军队的主要作战装备，驾乘战车作战即成为这一时期战争的特征。战车是当时的诸侯国最重要的军事装备，战车的拥有量，也是衡量各国军事力量的基本标准。

车战的基本作战单位是乘。乘是以战车为中心配以一定数量的甲士和步卒（徒兵），再加上相应的后勤车辆与徒役编组而成。所以乘是车、卒组合的基本单元，也是当时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。古代车战分攻守两种，攻车直接对敌作战，守车用于屯守及载运辎重。考古发掘证实，商代的战车为四马两轮，木质结构，重要部位一般还饰以青铜车器，西周和春秋时期战车的形制大体略同。

作战时，甲士在车上，步卒以两为单位随同战车行动；各战车的战车则以一定方式展开成阵。车上的甲士以手中的武器交手格斗，如果手中的武器是矛等直击兵器，如果一刺不中，两车错过，就失去了毙敌的机会。这时，戈的钩击功能便可大显其威。车上的甲士以手中的戈钩住对方颈部或衣甲，用自

身战车奔行的力量将对方拖下来致死或杀死。当时的步军也在作战中普遍使用戈，举戈执盾的战斗方式在先秦时期非常普遍。车战为主的先秦战争中，戈的优势是其他武器所无法比的，所以被列为当时的第一兵器。

直到战国时期，各国军队中战车的绝对数量仍然可观。据考证，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就记述了当时秦军的组成是“带甲百余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”。战国后期，铁兵器的广泛采用和弩的改进，使步兵得以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齐的车阵进攻。同时，由于战车本身车体笨重，驾驭困难，特别是当参战车辆的数量骤增以后，战车对于战场地形及道路条件仰赖日趋严重，其机动性随之减低，而小块耕地的大量出现又严重地破坏了井田的道路系统，更增加了战车团队运动作战的困难。此外，随着战争性质和结构的转变以及城邑地位的提高，对要塞的争夺日趋频繁，从而大大降低了战车在作战中的地位。于是，秦汉以后，传统的车战被历史所淘汰，戈自然也就随之退出了战争的历史舞台。

（据《刘继兴读史》）

知识集锦

不是所有夫妻都叫伉俪

“伉俪”这一称谓在现代泛指夫妻，但在古代，这个词可是非常有讲究的。这个称谓最早出自《左传·成公十一年》。唐初大儒孔颖达解释道：“伉俪者，言是相敌之匹偶。”“伉”本义是匹敌、相当；“俪”本义是配偶。“伉俪”即相匹敌的配偶。由此可知，事业各自有成，生活情趣又相仿的夫妻，才能称为“伉俪”。

（据《三晋都市报》）

“六亲不认”指哪六亲

根据西汉大才子贾谊的《新书·六术》，“六亲”之始，是“父”，六亲都是一个族内同宗的亲属，一共涉及六代人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中出现过“六亲”这个词语，而且有好几处，不过这段文字的注解，却有多种。其中一个说法称，“六亲”包括父、母、兄、弟、妻、子。还有个综合性说法认为，“六亲”包括父亲的兄弟们、舅舅们、父亲的姐妹、妻子的家属、丈夫的家属、本人的兄弟。

（据《城市快报》）

“五雷轰顶”的“五雷”是指什么？

在遭到了巨大的打击时，人们往往喜欢用成语“五雷轰顶”来形容。但其中的“五雷”指的是什么呢？要搞清楚这个，首先须搞明白一个古代盛行的学术概念：五行。

五行是我国古代一种物质观，五行学说最早出现在诸子百家中的道家学说中。它强调整体概念，旨在描述事物的运动形式以及转化关系。如果说阴阳是古代的对立统一学说，则五行可以说是原始的普通系统论。五行学说作为我国古代的物质组成学说，与西方的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元素学说类似，包含着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。

“五行”一词，最早出现在《尚书》的《甘誓》与《洪范》中，在《甘誓》中有“有扈氏侮侮五行，怠弃三正，天用剿绝其命”这样的句子，点出了“五行”这个词。《洪范》中则指出“五行：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……”而“五雷轰顶”中的“五”指的就是五行，代表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物质。因此，“五雷”就是金雷、木雷、水雷、火雷、土雷的合称。金雷指刀剑、金属、铁器、车祸等。木雷指棍棒、高处摔下、树木压住等。水雷指溺水、水淹、在行走中出意外、生病等。火雷指火烧、电击、雷击等。土雷指土埋、房屋倒塌、高处掉物等。古人还认为，被此五雷击倒者必定是罪孽深重的人。

“五雷轰顶”又作“天打五雷轰”，其另一层意思是告诫人们别作恶，如干了伤天害理的坏事后，一定会遭到上天用各种形式的惩罚。

（据《刘继兴读史》）

古代官场的“精神贿赂”

所谓“精神贿赂”，指一些厚颜无耻、动机不良之徒，靠阿谀奉承博得领导青睐，以达到谋取私利之目的，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拍马屁、抬轿子、戴高帽等。与物质贿赂相比，精神贿赂更具形式上的灵活性和行动上的隐蔽性。

古人说为臣有“六邪”，即所谓具臣、谀臣、奸臣、谗臣、贼臣、亡国之臣。其中一种就叫谀臣：上头说什么都欢呼叫好，上头干什么都说应当，暗暗探听上头喜欢什么就说什么、做什么、送什么，让上头听着看着拿着高兴。对于谀臣现象，早有先贤痛斥之，如孔子说“巧言令色鲜以仁”；荀子说：“谀谀我者，吾贼也。”战国时邹忌讽齐王说：“官妇左右莫不私王，朝廷之臣莫不畏王，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，他们自然都要拣您爱听的话说，由是观之，王之蔽甚矣！”但能听进去的官场之人委实太少了。

东晋后期，桓玄拥兵自重，最后干脆消灭了掌握朝政之司马道子父子，篡位自立，建立桓楚，改元“永始”。桓玄登位之初，在皇宫中刚坐上御座，椅子突然塌陷。正当群臣均大惊失色之时，侍中殷仲文开口说道：“这是因为陛下圣德深厚，连大地都载不起了，所以御座才陷落下去。”只一句话便令桓玄“大悦”。自此，殷仲文便成了桓玄的得意侍从。

南燕建平六年（405年），南燕皇帝慕容德去世，慕容超继承帝位。慕容超登基后，宠信旧部公孙五楼，听信其言，大杀功臣。慕容超对外连年征战，又喜好游猎，人民苦不堪言。一年冬天，南燕都城

广固发生地震，南燕境内的河流一汝水枯竭，黄河、济水冻合，澠水却连结冰都没有，慕容超很是苦恼。大臣李宣却宽慰他：“澠水之所以不结冰，是因为流经都城，近于日月（指慕容超）啊！”慕容超听后“大悦”，大大赏赐了“会说话”的李宣。

桓玄、慕容超最后都落了个国破家亡的结局。桓玄兵败后曾问身边诸臣：“我何以败乎？”吏部侍郎曹靖之说：“天怒民怨，焉能不败！”桓玄又问：“卿何不谏？”曹靖之回答：“当时朝中一片歌颂之声，都说当今乃尧舜之世，你也欣然相受，我还敢说什么呢？”桓玄听后无话可说。先前对桓玄大拍马屁的殷仲文，在主子危难来临时逃之夭夭，先是叛晋依桓，后来见桓玄大势已去，便又降附刘裕，最后还是因为谋反被刘裕所杀。慕容超也是亡于刘裕之手。409年，刘裕率军进攻南燕反击。次年，慕容超被俘，被送往东晋都城建康（今南京）斩首。

《宋史·宗室传四》记载：南宋庆元年间，韩侂胄专权。工部侍郎赵师择对之百般巴结。一次，韩侂胄赴宴，经过一处山庄，看到人工布置的竹篱茅舍，对赵师择说：“这里真是一派田园景象，就是缺点儿鸡鸣狗吠之声罢了。”过了一会，忽听草木丛中传来了“汪汪汪……”的狗吠声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赵师择蹲在那里学狗叫呢，逗得韩侂胄大笑，十分开心。不久，赵升任工部尚书。

明太祖朱元璋一次微服外出，路遇彭友信，正好雨过天晴，万里长空出现了一道彩虹。朱元璋兴之所至，信口吟了

两句：“谁把青红线两条，和风下雨系天腰？”彭友信灵机一动，马上应声接了两句：“玉皇昨夜銮舆出，万里长空架彩桥。”把朱元璋比作“玉皇”，说“万里长空架彩桥”的，就是你这位“昨夜銮舆出”的“玉皇”。朱元璋听后，龙颜大悦。吟诗的第二天早晨，就封彭友信为布政使。

解缙的谄媚之功夫，更在彭友信之上。某日解缙与朱元璋在御花园的池塘钓鱼，解缙技术好，接连钓了几条大鱼，而皇上钓了半天则一无所获，甚为尴尬郁闷。解缙道：“皇上，你没发现鱼也如此知礼节吗？”皇上听了疑而问曰：“此话怎讲？”解缙道，有诗为证：“数尺丝纶入水中，金钩抛去荡无踪。凡鱼不敢朝天子，万岁君王只钓龙。”朱元璋龙颜大悦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清人方飞鸿所著的《广谈助》中记载：一个读书人平素善谄，死后见阎王，阎王放了个屁，读书人上前鞠躬进辞：“伏惟大王，高耸尊臀，洪宣宝屁，依稀丝竹之声，仿佛麝兰之气。”阎王大喜，命牛头鬼带到别殿，赐给御宴。走到半路，读书人对牛头鬼道：“看汝两角弯弯，好似天边之月；双目炯炯，浑如海底之星。”牛头鬼大喜，扯着读书人衣袖道：“大王御宴尚早，先到家下吃个酒头来。”连阴曹地府的领导与工作人员都喜欢接受“精神贿赂”，可见其无孔不入之威力。

从古至今，黄钟毁弃、瓦釜雷鸣的悲剧延续了几千年，“精神贿赂”在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，令人痛心。

（据新浪网）